

俄國文化中的漂泊現象

蘇淑燕 / Su Shwu-yann

淡江大學俄文系副教授

Departmen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中文摘要】

本論文分析盛行於俄國文化中的漂泊現象，此現象於 19 世紀末年達到高峰，蘇聯後因為實施嚴格的戶口制度，方才絕跡。剖析此種文化特色的起源與民族性格的關聯性。根據史密諾娃(О. Смирнова)的分類方式，以是否有自由意志為區分標準，將俄國的漂泊現象分為兩大類：自願性和非自願性，第一類包括了宗教性的漂泊者和心靈-意識漂泊者，第二類則包括了逃難者、移民者、遊民、犯人。本論文主要是介紹和分析自願性漂泊者，將重心放在宗教漂泊者(朝聖、聖愚)和心靈-意識漂泊者的類型梳理和文學的呈現。

【關鍵字】

漂泊、朝聖、聖愚、心靈-意識漂泊者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wandering in Russian culture, which was very typical and popular especially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but total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ict passport's regime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made by A. Smirnova, who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Russian wandering: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this paper puts emphasis on the three subtypes within the first type: pilgrimage, foolishness for Christ and mind-wandering.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pilgrimage and foolishness for Christ (that refer to such behavior as abandoning house for a short or long time and taking a journey on foot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mind-wandering (which refers to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motivational

value of wandering with the motivational value of the everyday trivial activities), their peculiarities and reflections in Rus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wandering, pilgrimage, foolishness for Christ, mind-wandering

一、前言：俄國--漂泊的國度

漂泊是俄國文化中非常獨特之現象，別爾加耶夫(Н.Бердяев, 1874-1948, 俄國宗教政治哲學家)曾說：「俄國—是個心靈無限自由的國家、是漂泊和尋求神的真理的國家…俄國人輕易就可以克服資產階級的束縛，離開任何生活拘束、任何生活軌道。漂泊者的形象對俄國來說多麼典型，又是多麼美好」(Бердяев 1998:281)。這些人為什麼輕易離開溫暖的家，四處漂泊流浪？根據扎東斯基主教(Т.Задонский, 1724-1783, 俄國東正教會主教，18 世紀重要的東正教啟蒙者)的看法，家其實是一種形式的監獄，一種監禁，一種心靈的腐化，真正的漂泊者不會為此牽絆，也不會因此而停下腳步：「任何無法移動之物，包括房子、花園或其他類似物，都無法讓漂泊者停止去異鄉遊蕩」(Задонский 1994:47)。

大約16世紀，就有大批宗教漂泊者，因為不同目的，離開自己家鄉，在俄國境內流動。這些人可能是聖徒、朝聖者、乞丐、尋常百姓、流浪歌手、騙子、逃亡的農奴、聖愚者、躲避追殺的舊禮儀教派…，他們踏上無止盡的旅程，以徒步方式，在森林、西伯利亞、著名的聖地…漂泊、苦行或朝聖，匯聚成一股移動的浪潮。

到了18-19世紀，漂泊變成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再是宗教信仰者的專利，他們可能是信徒、知識分子、農民或是窮人，不管在鄉下或首都，大道或小巷，都可以看到不同目的的漂泊者，在路上踽踽獨行或成群結隊。俄國文化學家揚克緬科(Б.Якеменко, 1966~迄今，俄國歷史學家、社會運動者)在他的大作《10-18 世紀俄國文化》(«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X-XVIII веков»)就以專章介紹了俄國的漂泊特色。他評述當時俄國文化中的漂泊現象，曾說：「漂泊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特色，並不侷限於某個團體」¹(Якеменко 2003:269)。

¹ 本論文中的譯文除少數例外，皆為本人所譯。

普希金的好友恰達耶夫(П. Чаадаев, 1794-1856, 俄國哲學家)在1836年的《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中,提及了19世紀俄國人民的漂泊現象:「您瞧瞧四周...可以這麼說,整個世界都在移動...我們似乎注定無法在自己的家中待著;在家裡我們如同陌生人;在城市內我們形同游牧者,我們甚至比那些在草原中因為放牧羊群而四處移動的人還糟,他們跟草原的關係比我們與城市的關聯更加緊密」(Чаадаев 2006:9)。

整個俄國社會都在漂泊,而且不受階級、知識和財富所限制,不論是平民、知識份子或貴族,都曾經在某個階段離開家庭,前往不同地方流浪。有時漂泊現象是短暫的,達到某個目的,或是情緒改變了,就可以回家;有些人則是成了永恆的漂泊者,在不同城市、鄉村或荒野中流浪。整個社會的漂泊現象於19世紀末到達最高點,到了二十世紀蘇維埃革命,蘇聯成立後方才停止。

史密諾娃(О. Смирнова, 奧倫堡藝術學院(Орен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скусств им. Л. и М. Ростроповичей)副教授)以是否有自由意志為區分標準,將俄國的漂泊現象分為兩大類:自願性和非自願性,第一類包括了宗教性的漂泊者和非宗教性的漂泊者(心靈-意識漂泊者),第二類則包括了逃難者、移民者、遊民、犯人。本論文主要是介紹和分析第一類(自願性漂泊者),將重心放在宗教漂泊者(朝聖、聖愚)和心靈-意識漂泊者的類型梳理和文學的呈現。

二、宗教型漂泊者:

在所有漂泊者中,大多數的人因為宗教因素而離家,他們以步行、苦行、四處漂泊方式,在惡劣環境下生存。有些人是為了躲避宗教迫害,有些人為了朝聖,為了尋找神的應許之地,神聖的生存之地;或是透過苦行,透過與耶穌一樣的漂泊歷程,透過肉體的痛苦來淨化心靈、提升心靈。這些漂泊可能是短暫現象(譬如朝聖者到達聖地之後,就停止朝聖之旅),有些則是永恆,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永不止歇,成為永恆的漂泊者。

西方文學作品中最早的宗教漂泊者形象,應該就是耶穌、使徒、聖徒們,不論是《舊約》或《新約》記載了一群龐大的真理追尋者和他們的漂泊地圖,從出埃及、離開居住地、前往聖地,去耶路撒冷、到上帝之城,他們心之懸念的就是聖城的追尋。耶穌受洗後在曠野裡40天的禁食禱告、漂泊似的傳教方式,這些都說明了受苦、挨餓和漂泊,似乎是獲得真理、接近上帝的最佳方法。俄國東正教深受此影響,教義強調苦行和漂泊。費多托夫(Г. Федотов,

1886-1951, 俄國歷史學家、哲學家、宗教思想家)在敘述聖徒尼爾(Преподобный Нил Сорский, 1433-1508, 東正教聖徒)的生平事蹟時,曾提到,聖徒尼爾的苦行是種挨餓型的苦行,那是對耶穌受難的一種模仿。「貧窮的生活代表的不只是一種極端禁慾的表現,還是對福音書中受難耶穌的一種忠貞態度」(Федотов 2003:152)。這些“為了敬畏基督”(Христа ради)的漂泊者在極端惡劣環境挨餓受凍,就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讓他們得到精神昇華,得到進入上帝之城的人場卷。「這些遊蕩的經歷其實是一種成聖的過程,讓他們的內在產生變化和變形」(Якеменко 2003:272)。受苦、忍受飢餓、貧窮都是必經過程,必須經歷所有磨難,方能成聖成佛,所以俄國文化中才有「赤貧軀體,神聖心靈」(нищета тела и святость духа)概念的產生。

在所有的宗教漂泊者中,本論文只討論兩種類型:朝聖者(богомольцы)和聖愚(юродивые)。我們先從朝聖者說起。

2-1 朝聖者(богомольцы):

朝聖現象在俄國存在已久,朝聖者不分身分階級,農民、退休士兵、小市民、貴族,甚至連大公(古羅斯的統治者)、沙皇、沙皇家人也是。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朝聖者是女大公聖奧爾加(Святая Великая княгиня Ольга, 約在 920-969, 俄國女大公),她於 945-960 年統治古羅斯,是俄國第一個接受東正教的統治者(當時俄國還未將東正教訂為國教)。聖奧爾加兩次前往君士坦丁堡朝聖,第一次(954 年)前往受洗,第二次(957 年)則是官方訪問,親率大使團拜訪君士坦丁堡七世,此事件記錄在君士坦丁堡七世自己所寫的《關於拜占廷宮殿的儀式和典禮》(«Об обрядах или церемониях 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 двора»)一書中。

一開始俄國朝聖者的目標是前往國外,前往《聖經》、《使徒行傳》等所記載之聖城、聖山、聖地,譬如: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聖山阿索斯山(Святая гора Афон, Mount Athos)、埃及、巴里(Bari, 位於義大利),都是俄國東正教信徒熱門的朝聖地點。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然就是耶路撒冷。俄國文學或文化,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兩極化,一方面這是神聖之城、永恆之城和未來之城,在這裡耶穌展現了復活奇蹟,它是「遵守基督教義者冀求未來永恆生命的希望」(Моторин 1996:62),因為按照啟示錄所預言,當末日審判到來,耶穌二次降臨,不信教者受懲罰,而信教者獲得永生,與耶穌一起生活於新耶路撒冷。但是,另一方面,耶路撒冷也是墮落之城、背叛之城,耶穌在這裡被密告、逮捕,最

後釘上十字架。這個城市永恆地烙印了耶穌的受難和鮮血，人性的懦弱與背叛。耶路撒冷的二級對立性從古自今吸引了無以數計的俄國東正教徒至此朝聖。果戈里(Н.Гоголь, 1809-1852, 俄國作家)在1848年來到此地，寫下了看到這個城市的心情：

「我還從來沒有過這麼不滿意的情緒，在我來到耶路撒冷和離開後。唯一的收穫是我更了解自己的冷酷無情和自戀」(Гоголь 1994:435)。

原本果戈里滿懷期待，希望朝聖之旅可以讓他心靈淨化，獲得心靈平靜，但是他的期待落空，此次的旅程無法治癒他的心病，反而讓他對自己更加不滿，也讓他的精神狀況越形惡化。

另一位朝聖者卡普斯金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 А. Купустин, 1817-1894)描寫他第一次看到聖城時，則完全是另一種迴異心情：

「...我離開房間來到走廊，在我面前的就是基督的墳墓，如同從夢中甦醒過來般地矗立在我面前。地理的耶路撒冷從我眼中消失了，...土耳其的城市消失了...，這是歷史的、福音書上的耶路撒冷，彼地、彼時，不是我親眼所見之城，更像是出自我的想像；不是出自我的智慧，更像是出自我的心靈」(Капустин 2007:28)。

但是當東羅馬帝國於1453年被鄂圖曼土耳其所滅，莫斯科成為第三羅馬，俄國開始興起了神聖羅斯(Святая Русь)的概念，俄國就是神所應許之地，東正教的捍衛者和正統繼承者。丘切夫(Ф.Тютчев, 1803-1873, 俄國浪漫派詩人)在他的一首詩〈預言〉(«Пророчество»)恰如其分地說明了這樣的情緒：

И своды древние Софии,	圓頂的古老索菲亞教堂
В обновленной Византии,	在復興的拜占庭裡
Вновь осенят Христов алтарь	重新將陰影投射在耶穌祭壇
Пади пред ним, о царь России,	祭壇前站著俄羅斯沙皇
И встань как всеславянский царь!	如同全斯拉夫人的統治者一樣！

朝聖不假外求，不用千里迢迢跋涉到國外去，在俄羅斯境內也可以朝聖。眾城之母—基輔、大諾夫哥羅德城、莫斯科都是方興未艾的朝聖之處，宗教漂泊者喜歡前往之地。只要聽聞某個教堂、哪個修道院有聖徒、聖屍，或是出現神蹟，就會吸引大批信徒前往朝聖膜拜。「諾夫哥羅德地區在15世紀持續進行大規模移動，許多人前往北方沿海地區…」(Федотов 2003:175-176)。除了大諾夫哥羅德，莫斯科也是另一個聖地，人們絡繹不絕地前往莫斯科朝聖：莫斯科人「在16世紀中期前經常在自己的城牆內、宮殿內，看到大批的過路之人」(Федотов 2003:177)。

這些朝聖者通常不會一個人上路，他們大約10-15個人一起，有時村裡的人還會集體幫他們準備路上所需。朝聖者必須先沐浴更衣，換上乾淨衣服。因為採集體行動，朝聖者是所有宗教漂泊者中人數最多，陣容最龐大的一群人。根據莫科連左娃(И.Моклецова，莫斯科大學外語與宗教系教授)的研究，在18世紀80年代拜訪薩洛維斯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ая монастырь)的朝聖者大約一年有兩萬人，到了1912年則是兩萬兩千人。而聖薩洛夫男子修道院(Свято-Серафимо-Саровский мужской монастырь)於1903年的某次節日慶祝會，聚集了30萬個朝聖者，為此，郊區築起了6層樓的大型木製建築，仍然不足以應付眾多朝聖人潮，擠不進去的人，就只能分散在修道院附近森林的空房裡 (Моклецова 2003:43)。

俄國的宗教朝聖現象在19世紀達到了高峰，「每年前往聖地的人數達到了1萬到1萬2千人，其中7千人是女性，大多是年紀35-40歲的中年婦女，至多不會多於50歲」(Моклецова 2003:43)。





大部分的朝聖者於來到旅行目的地之後，任務完成，旅程便告結束，啟程回家。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又開始他們的朝聖念頭，著手準備，之後再繼續開始朝聖之旅。通常朝聖者於一生中會有好幾次的朝聖行為，可能每年於固定時間去同一個地方(如同台灣進香團固定去某些廟裡拜拜一樣)，也可能沒有固定時間、沒有固定地點。

涅克拉索夫(Н.Некрасов, 1821-1878, 俄國作家、詩人)在他自己的史詩作品《誰在羅斯能過上好日子》(«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就有一個章節描寫俄國農民於秋天農忙結束後，村裡女人成群結隊去朝聖的盛大景象，即使路上遇到騙子、小偷，也不改其志：

Пускай народу ведомо,	就讓大家都知曉
Что целые селения	好幾個村裡的人
На попрошайство осенью,	秋天時告別家小
Как на доходный промысел,	如同出門做生意
Идут: в народной совести	徒步去朝聖：
Уставилось решение,	決定做得巧
Что больше тут злосчастия,	不幸雖然多
Чем лжи,- им подают.	總比謊言好
Пускай нередки случаи,	雖然壞事真不少
Что странница окажется	有人是小偷；
Воровкой; что у баб	也有大騙徒
За просфоры афонские,	用阿索斯山的麵包
За "слезки богородицы"	聖山上的"處女之淚"
Паломник пряжу выманит,	騙走女人們的線紗
А после бабы сведают,	事後才會知道
Что дальше Троицы-Сергия	比三一修道院更遠之聖地
Он сам-то не бывал.	騙子根本不曾到

史詩中提到了莫斯科近郊的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Троица-Сергиев лавра)，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聖地，卡拉姆金(Н.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俄國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稱它為俄國的精神中心(духовный центр)，來自俄國各地之人不辭辛苦，至此瞻仰聖地，膜拜聖體。因為地利之便，多數朝聖者來自於莫斯科，但是外縣市之人也不少：「莫斯科居民在他開心或悲傷時刻，會來此朝聖，除此之外，其他離首都很遠的人也會來此」²。19世紀由莫斯科到此修道院的路上朝聖者絡繹於途，是非常有名的朝聖路線，不少俄國作家都有描寫它。譬如：卡拉姆金的旅行雜文《前往聖三一修道院的歷史註記和回憶》(«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 пути к Троице»)，和史緬廖夫(И.С.Шмелев, 1873-1950，俄國流亡作家)的小說《朝聖》

²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 пути к Троице.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iknigi.net/avtor-nikolay-karamzin/59695-istoricheskaya-vospominaniya-i-zamechaniya-na-puti-k-troice-nikolay-karamzin/read/page-1.html> 原文如下：«Не только жители Москвы и въ радостяхъ и въ горестяхъ своихъ посѣщаютъ ее, но и другіе, изъ самыхъ отдаленныхъ мѣстъ отъ столицы, ѣздятъ сюда на богомолье».

(«Богомолье»), 主角們都是沿著這條路從莫斯科前往聖三一修道院。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卡拉姆金是以一個歷史學家和官員的身分,用客觀眼光看著路上不絕如縷的朝聖者,侃侃而談每個地方的歷史演變和宗教意涵;而小說《朝聖》的主角們則是信徒,從集合出發,路上經過的每個村莊、地洞,一直到目的地,參觀修道院裡面的教堂和聖地。對他們來說整個路程就是心靈洗滌和淨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他們克服了各項阻礙,包括家人的反對和阻擾、路人的嘲笑、心中恐懼等等,最後順利到達修道院,在聖人的遺體前膜拜,獲得了全新的精神高度,成了全新之人。

2-2 聖愚漂泊者(юродивые):

另一類宗教漂泊者是聖愚。聖愚是俄國文化中非常特殊現象,有點類似中國文化中的濟公。他們是無家可歸的漂泊者、貧窮乞丐,通常出現在城市或鄉下市鎮等人潮聚集之處,外表和行為舉止看起來就像普通的白痴,痴痴呆呆,整天哭或是笑,穿著破爛,衣不蔽體,甚至是裸體,只在腿/腰上綁上布條,遮住重點部位;他們通常不穿鞋子,不管冬天或夏天都是赤腳行走,因此身上或腳上經常會有凍瘡或膿瘡。聖愚很少說話,即使開口,也是斷斷續續,詞句不連貫。但是他們卻受到人民高度歡迎和尊敬,被認為是聖者、先知、智者,所說之話被視為具有警示意義,如果預言屬實,事蹟顯著,功勳卓越,就會被教會封為聖者。

為什麼愚笨的人在俄國社會被視為智者,甚至是聖者?聰明的蠢人,有智慧的愚痴者—這是怎樣的悖論?俄國著名文學和文化評論家潘荃科(А.М. Панченко, 1937-2002, 俄國語言學家、文學文化評論者、科學院院士)提出了他的解釋,他認為聖愚者的愚痴是裝出來的,並不是天生,是對不公社會的一種抗議行為。他們是稱職的演員,在民眾面前扮演白癡的角色。白癡是他的面具,是面對人群時的一種道具。當他獨自一人,無需面對觀眾,便會卸下面具,成為正常人。聖愚者需要這個面具來讓民眾注意到他,如同舞台上演員的濃妝艷抹和誇張的肢體動作,是為了異於常人,與眾人區隔,讓大家聚焦在他身上。

「聖愚者是演員,因為當他自己一人時,不會裝瘋賣傻。白天,他永遠在街上、在人群擁擠中,也就是他的表演場所出現。為了觀眾他戴上白癡的面具,如同小丑般的愚弄和胡鬧」(Панченко 1999:394)。

潘荃科在文章中舉了一個例子，舊禮儀教派的聖愚者阿法納西(Авраамий, Юродивый Афанасий, ?~1672)，當他還未逃跑到北方時，是個聖愚者，無論夏天或冬天都在大諾夫哥羅德市徒步行走，邊走邊哭，說話很小聲；然而當他的老師阿瓦庫姆(Аввакум Петров, 1620或1621~1682，舊禮儀教派的領袖)被捕，他與其他舊禮儀信徒為了躲避宗教迫害，逃跑到北方某個修道院。他成了這群人的領袖，這時，他脫去了癡愚的裝扮，搖身一變，成為編年史修士，開始撰寫詩歌和小說。之前的癡顛都是假裝的，其實他是知識份子，受過教育，能識字會寫書。這種表面上的愚痴當然不只阿法納西一人，歷史上比比皆是，根據費多托夫的說法，俄國第一個聖愚者彼丘爾斯基(Исаакий Печерский, ? ~ 1090)和斯莫連斯基 (Авраамий Смоленский, 1172或1150 ~ 1221或1224)，在某些版本傳記裡，他們的痴愚行為並不是天生，而是短暫現象，經歷某些事件後，就回復成正常人；或是相反，從正常人變成聖愚者。

這些聖愚者共同特徵就是具有預言能力，他們的預言通常都是不好之事，死亡、分離、大火等等，讓人民心理產生畏懼。他們許多人據說可以實施神蹟，著名的聖瓦西里(Василий Блаженный, 1469-1552，莫斯科的聖愚者)就是神蹟的施行者。有關他施行過神蹟傳說有：讓女人全盲，然後又恢復她們的視力、預言1547年莫斯科的大火、用三杯葡萄酒把大諾夫哥羅德的大火熄滅…。米哈伊爾(Михаил Клопский, ? ~ 1453或1456)則是表演了穿牆能力，在他剛到克洛普修道院(Клоп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時，直接穿越一道關閉之門，進入修道院院長內室，讓在場人士驚訝不已。

為了吸引他人注目，聖愚者的服裝也都經過精心設計，讓他可以有別於其他城市居民，老遠便可以辨識出來。有些聖愚者是裸體，有些則是穿著破爛單薄的衣服，赤腳行走，一年四季，皆是如此。俄國冬天酷寒，寒冷的冬天中赤腳行走，無疑是一種試煉，就如同台灣的乩童赤腳走在火上一樣不可思議，令人側目。在眾多不同穿扮中，潘荃科認為：「聖愚者最好的服裝就是裸體」(Панченко 1999:394)，裸體讓他們與其他城市居民完全不同，成為個人獨特標誌，可以在人群中輕易被認出來。有些聖愚者還會在脖子掛上金屬鏈條，或是帶上鐵帽子，走起路來叮噠作響，透過聲音老遠便知道他們的出現³。最著名的裸體聖愚者是聖瓦西里，根據他的生平紀事，16歲逃家後，開始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裸體。在莫斯科的聖瓦西里大教堂收藏他多幅聖畫

³ 美國學者湯普遜(E.M. Thompson)指出聖愚和薩滿的關聯，認為金屬鏈條源自西伯利亞薩滿巫師的穿著。

像，全都是裸體畫像。

潘荃科認為裸體具有雙重性，既象徵天使般的純潔，也象徵惡魔的誘惑。對某些人來說，聖愚者的裸體可能是拯救，對某些人來說卻可能是誘惑(Панченко 1999:395)。也有人認為裸體源於五、六世紀敘利亞和埃及的修道院生活傳統；美國學者湯普遜(E.M.Thompson, 1937~迄今，波蘭裔美國學者，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教授)則認為應該源自薩滿教傳統⁴。費多托夫則認為來自拜占庭淵源，其中聖西蒙(св. Симеон, VI 世紀)和聖安德烈(св. Андрей, 約在 IX 世紀)對俄國的聖愚文化影響最深(這也是大多數俄國學者的共同看法)。

我們的看法與上述學者都不同。裸體是罪犯的象徵，聖愚者的裸體應該是對耶穌受刑時的裸體模仿，而不是象徵天使的純潔(天使白白胖胖，與聖愚者瘦骨嶙峋的樣子差距非常大)，或是惡魔的誘惑(聖愚者身上佈滿褥瘡和膿瘡，身體骨瘦如柴，老態龍鍾，難看無比，完全沒有身體的誘惑力)。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衣服(內外衣)被士兵瓜分一空，所以那時他是裸體的：「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裡衣，這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約翰福音》，19:23)。

如果細看聖瓦西里的聖像畫和耶穌聖像，將兩者放在一起比較，會發現除了全裸造型外，有些聖像畫裡的聖瓦西里會在腰上纏住一條綁巾，其造型和形象與十字架上的耶穌如出一轍，同樣的裸體、同樣的綁巾、同樣的瘦骨嶙峋。因此，聖愚者的裸體應該是對耶穌受難的模仿，而不可能是象徵天使的純潔或惡魔的誘惑。



聖愚者經由裸體，忍受天氣的酷寒和炎熱，忍受赤腳踩在冬天雪地或夏天燒燙的石頭路上，藉由忍受身體的苦痛，來感受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忍受

⁴ 「因為裸體是在基輔公國解體之後流行起來的。考慮到上述事實，我認為這一習慣來自於薩滿教傳統。」(湯普遜 1995:148)

釘刑的痛苦。這些忍受痛苦的經歷是東正教所歌頌的苦修，只不過大部分的苦修人士前往森林或沙漠修道，而聖愚者則是在城市中藉由裝瘋賣傻、忍飢受凍、忍受譏笑和侮辱來自我修行，這也是一種成聖的過程。

卡瓦列夫斯基主教(Иоанн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905-1970, 俄裔法國聖像畫家、哲學家、法國東正教會主教)在有關聖愚者的專書裡，認為聖愚者的功勳比沙漠苦修士更為偉大，對東正教的貢獻更形巨大。

「沙漠的好處是可以學習空腹節食和夜禱，『遠離吃太多、過於嬌嫩、過度浪費』，但是，無庸置疑，他必須讓位於“為了敬畏基督”的聖愚者。…如果沙漠對於修士的精神拯救來說意味著較少的誘惑，那自然地，那些入世拯救者的功勳是更大的…」(Ковалевский 2013:12-13)。

卡瓦列夫斯基主教以影響層面和修行難易度出發，比較兩者，得出後者高於前者的結論。聖愚者是入世的修士，他們在人間修行，藉由低賤惡劣的環境，空乏其身、餓其體膚，鍛鍊他們的心性。人間修煉遇到的挑戰當然比出世修煉來得高，也來得多。聖愚者遭遇過許多無理對待，被打、被嘲笑、被綁、被殺不一而足。譬如：聖瓦西里曾被商人打到遍體鱗傷；有些人被鐵鍊拴在牆上，如同狗一樣的屈辱。而阿法納西則是因為他的言論觸怒當局，最後被燒死在紅場對面的沼澤廣場(Болотная площадь)。聖愚者對體制、制度的挑戰和蔑視，造成他們處境危險，生命受到威脅，這些，都是森林或沙漠修士所遇不到的挑戰。

聖愚進入俄國文學，受到不同作者的描述，各式各樣的使徒、聖徒傳記、編年史，記載了這些人的生平事蹟，其他的文學作品也處處可見聖愚者的身影。譬如卡拉姆金所編的《俄國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一書，描寫了聖愚者約翰(юродивый Иоанн, ?~ 1589)和聖瓦西里的事蹟和身影。

「當時在莫斯科有一位聖愚者，被視為聖徒或疑是假聖徒，受到人們尊重，他頭髮四散，赤腳走在嚴寒的街道上。預告各種壞事的發生，還當眾指責鮑利斯·戈東諾夫；巴利斯只能沉默以對，不敢處罰他」⁵。

普希金採用了卡拉姆金書裡有關聖愚者約翰和聖瓦西里的事蹟，在自己的悲劇《巴利斯·戈東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裡，融合成一位杜撰的聖愚者尼科卡(Николка Железный Колпак)，此人在1605年莫斯科的教堂廣場前，對

⁵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ом 10. глава 4.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kulichki.com/inkwell/text/special/history/karamzin/kar10_04.htm

著戈東諾夫大喊：你是殺人者，殺害年幼沙皇，並拒絕為戈東諾夫禱告祈福。後來穆索斯基(М.Мусоргский)將此改編成歌劇，尼科卡的哭泣部分成為歌劇中非常著名的一段。

聖愚者(看見了戈東諾夫)：啊!啊!啊!巴利斯!聖愚者被侮辱了!

戈東諾夫(停在聖愚者前面)：他為何而哭?

聖愚者：小孩把我的錢搶走了，快點命人把小孩給殺了，如同你殺了小沙皇一樣。

大貴族們：笨蛋，閉嘴!把這個笨蛋帶走。

戈東諾夫(用手勢命令大貴族們停止行動)：別碰他。為我禱告，聖者…。

聖愚者：不行，巴利斯!不行，不行，巴利斯!我不能為大希律王禱告，聖母不允許。流吧，辛酸的眼淚流吧!哭吧!東正教的心靈哭吧!敵人要來了，即將變成黑暗!穿不透的黑暗!苦啊!羅斯的苦!哭吧!飢餓的俄國人哭吧!⁶

托爾斯泰在自傳三部曲第一部《童年》(«Детство»)中，描寫了聖愚格里沙(Гриша)。格里沙具有聖愚者典型特徵：骯髒發臭的外表，奇怪舉止、怪異笑聲、不連貫的話語、漂泊生活、預言能力，和兩極化對待他的態度：有人尊敬他、有人嘲笑他、厭惡他；有人認為他是預言家、苦行者，有人卻認為他只是懶惰，不願意工作，只想白吃白食的流浪漢。作者透過小孩子的眼光來描寫這位居無定所的漂泊者，他對宗教的狂熱，和嚇人的舉止(抓住弟弟沃洛加 Володя 的頭，死盯著瞧，然後流下眼淚，預言他年幼就會離家)。

不管是聖愚者或是朝聖者，這些俄國宗教漂泊者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貧窮，他們奉行的是基督的苦修，因此拋棄家裡所有一切，所有錢財和地位，身無分文的上路，肩上的小袋子、手上的拐杖，就是他們僅有的行囊。他們衣衫襤褸，以徒步方式，在俄國廣大國土上漂泊，可能是為了朝聖、尋找聖地，也可能漫無目的。但是每到一處，不管是農民或地主，不管窮人或富人，都有人願意接待他們，提供他們食物，讓他們在家裡過夜。俄國評論家薛潘斯卡雅

⁶ 此為歌劇版本，尼科卡所說的話(歌詞內容)在歌劇版本與普希金的悲劇幾乎如出一轍，穆索斯基只是將三個場景合成一個，詳見：

http://webkind.ru/text/56124271_54320282p902478435_text_pesni_mmusorgskij-boris-godunov-scenayurodivogo.html。

(Т.Щепанская, 俄國科學院人類學和民族誌博物館高級研究員、聖彼得堡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在她有關俄國道路文化的書裡,收集了非常多例子,證明當時俄國社會對這些漂泊者的好客和慷慨行為。

「以前任何一個漂泊者都會被邀請進家裡:讓他們吃飯,接待漂泊者被認為是善行,為了敬畏耶穌;」他們把窮人帶入家裡,如同膜拜上帝一般,信神的老女人認為,如果不讓這些人過夜,可是大罪。」(Щепанская 2003:429)

人們熱情地款待這些貧窮流浪漢,把他們當作先知、當作神。曾經有過一些傳說,繪聲繪影地描述耶穌以漂泊者的樣子來到人間,測試人們的愛心。於是信教之人把每個路過的窮人都當作耶穌,接待他們,與他們對談,如同獲得神諭一般。這種對窮人/漂泊者的好客和熱情是俄國文化獨特現象,也因此,漂泊者=窮人就成了固定概念。坐著馬車四處旅行,舒服地在車上打盹,不被認為是漂泊者,而是旅行者(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揚克緬科就說:「窮人等同於那些受神保護之人的概念實非偶然... ,在民間詩歌裡窮人被描述成在耶穌基督保護下之人,而窮人就是對耶穌的模仿」(Якеменко 2003:276)。所以漂泊者必須是窮人,必須居無定所,無所依靠,而接待這些漂泊者,就等同於接待基督,是重要的善行。俄文裡存在兩個詞,非常深刻地呈現了這個文化特色:нищелюбие (喜歡窮人) 和 странноприимство (接待漂泊者)。窮人—遊蕩者—接待漂泊者三者之間環環相扣,成為俄國東正教文化中非常獨特的現象。

三、心靈漂泊者:

除了宗教漂泊者,還有不是因為宗教因素(或不純然為了宗教因素)而離家流浪之人,這些人大量進入俄國文學,成為非常重要的篇章,是19世紀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這些人被稱作心靈漂泊者(духовный странник),他們離家有時不是為了宗教因素,不是為了敬畏耶穌而受苦,他們漂泊是因為與家人格格不入,對社會不滿,所以自我放逐;也可能是為了尋找自我定位,為了完成任務、證明自身能力,或是為了思索自我存在的價值,找到真正幸福。

岡查洛夫(Н.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 俄國作家)在他未完成的中篇小說《尼丰朵拉·伊凡諾夫娜》(«Нимфодора Ивановна»)寫到俄國人為何喜歡漂泊的生活:

「沒有心靈的移動不可能有所謂的幸福...這個臉紅、健壯的胖子,整日坐在鬆軟的枕頭上,睡眠惺忪地望著人們,跟人們沒有任何接觸,對他們沒有任何感覺,既無忌妒、愛,也無痛苦或高興...他不幸福,也不可能幸福,因為他

實在太安逸，因為他不會愛、不會忌妒，不懂欣賞，也不懂痛苦」(Гончаров 1992:56)。

這種因為心靈痛苦而漂泊，被稱作心靈漂泊者。俄國歷史上有許多知識份子(不論是文學家、文學評論家或是哲學家等)都喜歡漂泊，譬如萊蒙托夫(М.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俄國詩人和小說家)就曾在詩作中稱自己是個漂泊者：

Нет, я не Байрон, я другой,	不，我不是拜倫，我是另外一個
Еще неведомый изгнанник,	我是不為人知的放逐者
Как он гонимый миром странник,	如同他一樣被世界所驅逐
Но только с русскою душой ⁷ .	只是帶著一顆俄國的心。

羅贊諾夫(В.Розанов, 1856-1919，俄國宗教哲學家、文學評論家)曾經這麼說自己：我是「漂泊者，永恆的漂泊者，不論到哪都是」(Розанов 1990:78)。葉謝林(С.Есенин, 1895-1925，俄國新農民派詩人)不喜歡待在家鄉，喜歡四處漂泊，他在一首詩中寫者：

Устал я жить в родном краю.	我厭倦了住在自己成長之地
В тоске по гречневым просторам	我眷戀那長滿蕎麥的大地
Покину хижину мою.	所以我將離開我的小屋
Уйду бродягою и вором.	像流浪漢和小偷般地拋棄

大文豪托爾斯泰(Л. Толстой, 1828-1910，俄國知名作家)的漂泊則是發生在生命的晚期，他晚年的離家事件(уход Толстого)，就是為了追求心靈自由所做的反抗行為。對他來說，家庭、財富、文學上的成就都無法帶給他幸福和滿足，反而成為妨礙他心靈自由的枷鎖，最後30年的婚姻生活，在晴園(Ясная поляна)豪奢的生活模式，對他來說是一種痛苦不堪的折磨。他想要過簡樸的生活而不可得，想放棄一切錢財，將版稅捐出來也不可得，所有他想做之事，都不被妻子和小孩所接受，無法付諸實現。他和妻子索菲亞、自己的小孩間精

⁷ 事實上，萊蒙托夫兩次放逐高加索，都並非自願，算是非自願型的流浪者，但是他與上流社會格格不入，孤芳自賞，自認為是心靈流浪者。他作品中的主角都具有反社會人格，不管被迫(譬如惡魔、童僧)或半自願(畢巧林)，都算是心靈流浪者。

神上出現嚴重落差，尤其索菲亞那緊迫盯人、恐怖的偷窺、無所不在的監視、歇斯底里、服毒、跳湖等種種不可名狀的行為⁸，讓他在自己家中、在最親近的人之中，無法感受溫暖，只有莫名無端、無止盡的痛苦。家庭生活成了苦牢、成為精神折磨的來源，這樣的生活他忍受了30年。當所有人都認為他應該就這樣忍受到死，托爾斯泰卻在他垂暮老年、生命燭光即將熄滅之際出走了。「他的出走和死亡，就如同活著一樣，是真實的、真誠的，也是簡單的」(Чертков 1922:68)。

他不願意再度忍受妻子的精神虐待，毅然決然離開家。離家後他獲得了心靈自由，旋踵因為染上風寒，最後惡化成肺疾，奄奄一息，他依然不悔，心靈的自由比身體的健康更為重要。他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上寫著：「...我只想要一件事：自由，擺脫她，擺脫這個謊言、做作和浸透她全身上下邪惡...，所有她對我所做之事，不是愛的表現，而只是坐實了她想殺死我的意圖...」(Чертков 1922:54-55)。出走讓他獲得了生命中最後的自由和喘息，也讓他得到永恆的休息—死亡。

除了現實生活，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大量的心靈漂泊者，例如：俄國童話故事裡追尋另一個國度(иное царство)的主人公，有些人離家理由就是因為不滿足現實世界，於是離開家鄉尋找新的國度。「尋找“另一個國度”或是“新的地方”的都是那些不滿意生活之人」(Трубецкой 2011:5)。但是不同的主角對生活的不滿原因各不相同，這與主角們的心靈層次有關。特魯別茲基(E. Трубецкой, 1863-1920, 俄國哲學家 and 法學家)將童話故事中的追尋者分為三個不同的心靈層次：低層次、中層次和高層次。最低層次之人，是為了滿足物質需求，為了追尋財富，啟程前往美麗新世界。他們通常來自於貧窮之家、社會下階層，離家是為了尋找黃金、尋找財富，或是為了完成任務而獲得財富、新娘或是地位(變成貴族、沙皇...)。但是有些主人翁對金錢財富並不在意，即使舒適的家和美好的物質環境都不能阻擋主角尋找新世界的決心，他們對生活的不滿在另一個層面：「在灰暗的普通人類生活中既沒有真正的善，也沒有真正的壞。平凡的生活讓他們覺得疏離，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因此一切都是苦悶、沒有色彩」(Трубецкой 2011:7)。對於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尋找生命的價值和心靈的滿足，而這些滿足必須透過離家尋找的歷程方能獲得，那是一種「從

⁸ 關於索菲亞於托爾斯泰生命最後幾個月(1910年)，對他所施行的種種精神虐待詳見：Чертков В.Г. Уход Толстого. М.: Изд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олос Толстого”. 1922. С.47-63.

現實上升到奇幻世界」(подъём к чудесному над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м) (Грубецкой 2011:9)的過程。奇幻世界充滿了絢爛色彩，在這些歷程中他們心靈獲得充實。一旦從奇幻世界中歸來，惆悵無聊、空虛和遺憾的感覺又回來了。於是童話故事通常以主角離家開始，以主角返家結束。李哈喬夫(Д.Лихачев, 1906-1999，俄國語言學家、文化學者、科學院士)說：「童話故事的情節—就是主角在廣大童話空間中的旅程」(Лихачев 1987:632)。主角們克服各式各樣的險阻，到達奇幻王國，得到財富、救回美女，最後回到自己家鄉，結束了旅程。

相對於童話世界中那些亟欲擺脫灰暗現實世界，追求絢麗魔幻世界旅程的旅行者，俄國文學中還有一些漂流者，他們本身不是聖徒、不是聖愚者，卻為了追求上帝之城、永恆生命，或是為了獲得心靈自由而踏上了旅程。這些人都具有反社會傾向，與家人、親人無法溝通，或是對現實的生活感到不滿、無奈。對這些人來說，現實世界、溫暖的家庭生活變成一種枷鎖，是禁錮心靈自由的囚牢。普希金在詩歌《漂泊者》(«Странник»)中，描述了追求宗教救贖的逃脫者。主角在人間感到痛苦，因為人間生活有死亡、有恐懼、有死後審判(«Я осужден на смерть и позван в суд загробный»),而他尚未準備好面對這個審判。於是他害怕、崩潰、徬徨無助，躺在床上，發高燒夢囈。他的精神狀況變成了身體疾病，家人完全無法了解和諒解。在這首詩中，很明顯地存在兩個不同世界，一是人間世界(дольний мир)，另一個是高山之國(мир горный)，詩人用兩個不同的空間—山谷和高山，不同的位置，高和低，來強調人間和天國的對立。位在高山之巔的上帝之城，需經過救贖之路(спасения верный путь)、穿越擁擠的天堂之門(тесные врата)，方能到達。而人間世界和家庭，都成了不自由的象徵，束縛了主角、蒙蔽了他的眼睛，讓他成為病人、成為盲人。詩中透過一個讀書的年輕人(Я видел юношу, читающего книгу)，成為醫治主角心病之人，年輕人用文字(這裡象徵了聖經或東正教教義)，讓他開了眼，並且指引了他逃亡方向。於是主角看見了光芒(свет) (這裡象徵了耶穌、真理)，看見了通往真理的道路，他開始義無反顧地逃跑，不顧身後妻子、小孩的呼喚、朋友的指責、鄰居的追趕，只為了到達天堂。

遊蕩=自由，在詩人曼德斯坦(О.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俄國詩人)的筆下，遊蕩+自由變成了：посох (手杖)，那是自由飄蕩、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朝聖、心靈的淨化旅程：

Посох мой, моя свобода, сердцевина бытия. ... Я земле не поклонился Прежде чем себя нашёл Посох взял, развеселился И в далекий Рим пошел. ... Снег растает на утесах, Солнцем истины палим, Прав народ, вручивший посох Мне, увидевшему Рим!	我的手杖是我的自由， 存在的核心 ... 在沒有找到自我前 我不會對大地臣服 我拿了手杖，笑開了懷 我往遠方的羅馬前進 ... 懸岩上的積雪將融化 將被真理的太陽澆融 人民多麼睿智，將手杖交給了 看見羅馬城的我
---	--

漂泊的人都是孤單的，但是曼德斯坦詩中的漂泊者卻怡然自得，拄著一根拐杖，走到哪都開心，神無所不在，給予漂泊者照應和眷顧，他是自由的漂泊者，他的心靈充滿了神的恩惠，無處不自在。

與此相反，《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中的主角和《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中的畢巧林卻是在哪都找不到心靈休憩場所，他們四處尋找幸福，但是，幸福卻遍尋不到，套用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國作家)的評語，他們是“不幸福的漂泊者”(Несчастливый скиталец)。奧涅金不管在彼得堡或鄉下，或是出國旅行，不論在哪，都治癒不了他的憂鬱症，找不到自我，遍尋不著心靈的避風港。不論身處何處，永遠感覺自己是個“他者”，在國內如此，在彼得堡如此，鄉下如此，在國外更是如此。他尋求塔吉雅娜的愛，作為精神依託、心病的解藥，卻被拒絕，只能繼續自我放逐、獨自啃食永恆的孤單，沒有愛、沒有朋友、也沒有停泊點。而在廣大俄國境內自我放逐的畢巧林，也是為了尋找幸福、尋找心靈的休憩地而漂泊。然而，不管是高加索的山區、溫泉度假聖地五峰城、濱海城市塔曼，即使獲得了貝拉溫柔的愛，仍然餵飽不了他無止盡的幸福需求。他時時刻刻覺得不幸，繼續地追逐幸福。然而即使挑戰禁忌的愛、衝鋒陷陣殺敵，與他人決鬥，不論做什麼，不管去哪，都找不到幸福，反而帶給別人不幸。他極度冷漠，內心比冰還硬，比雪還冷，別人或自己的生死對他都無所謂，全都視之無物，不屑一顧。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關心，只是不斷地製造別人的痛苦，從中取

樂。他的心病無處可醫，也無人可醫，只有死才能化解他的痛苦和孤單。

根據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看法，這些不幸福的漂泊者，這些脫離了人民的知識份子和貴族青年，他們的痛苦和憂鬱來源，是因為他們野心很大，苦苦追尋的並不是個人幸福，他們要的全世界的幸福，永不滿足。當人民都不幸福，他們也無法尋得自己個人的幸福，只能永遠痛苦。「俄國的漂泊者需要全世界的幸福才能讓他獲得安慰：廉價的幸福無法讓他妥協」(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4:137)。

從童話到小說，從民間文學到19-20世紀文學，從作家到作品，綜觀俄國文學中的心靈漂泊者，他們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離開家，為了尋找財富、尋找幸福、尋找自由，或是藉由肉體痛苦，尋求心靈的昇華，尋求進入上帝之城的恩賜。尼奇帕洛夫(Б.Ничипоров, 1953-2003, 東正教牧師、心理學家)認為可以將他們區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該隱似的漂泊者，他們不斷地奔跑，受到不知名力量的驅趕，害怕而且根本無法暫停；而第二類則是帶著快樂、心平氣和的上路，因為只要跟上帝在一起，任何地方都很好⁹。

俄國心靈漂泊者最大共同特色在於心靈孤獨，這些人通常具有反社會人格，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他們的想法不能為家人或同時代人所接受，被大家視為異類，他們在家裡或社會中感到孤單，家/家鄉對他們來說等於異域，家人或朋友跟陌生人差不多。於是他們只能拋棄一切，孑然一身，四處漂泊，可能在俄國、可能到國外，有目的或無目的的旅行。上述普希金《漂泊者》主角、托爾斯泰、奧涅金和畢巧林都具有此一特點，他們在家裡、在社會上、在人群中感到全然的孤單。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 俄國象徵主義作家、哲學家)有一首詩叫〈異鄉-故鄉〉(«Чужбина-родина»)非常好地表現了這樣的感受：

Нам и родина — чужбина,	對我們來說，故鄉如同異域
Всюду путь и всюду цель.	四處都是路，到處皆可去
Нам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долина —	對我們來說，一望無際的平原
Как родная колыбель	如同故鄉的搖籃般有趣

⁹ Ничипоров Б.В. Введение в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психологию. Глава: 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klikovo.ru/books/47140/47166.html>

除了上面所述，心靈漂泊者還包括那些心理上不認同此地，想要離開去彼鄉，卻因為諸多原因無法離去之人，也就是沒有實際漂泊行為的人。史密諾娃(О. Смирнова)將這兩類混在一起，擴大稱為心靈-意識上的漂泊(«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о духовно-мысленное в иные земли），「他們包括了那些實際上離開去俄國境內…或者去了西方漂泊之人，或者單純只是夢想著要去某個傳奇國度…」(Смирнова 2010:122)。我們可以將托爾斯泰的《庫茲米奇長老死後出版之筆記》(«Посмертные записки старца Федора Кузьмича»)、《復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契訶夫的《三姊妹》(«Три сестры»)、布爾加科夫的《佐雅的公寓》(«Зойкина квартира»)視為此類型的代表。這些作品的主角們為了某些因素無法離開，卻不斷地夢想著離去，一部分的人，譬如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在黑暗中照耀的光》«И свет во тьме светит»)、伊凡·瓦希里耶維奇(《舞會過後》«После бала»)在歷經長時間的痛苦和心理折磨之後，最後獲得心靈洗滌，得到新生；然而絕大多數的主角(例如佐雅·別列茨(Зоя Пельц)和帕維爾·歐柏里揚尼諾夫(Павел Обольянинов)(《佐雅的公寓》«Зойкина квартира»)並未從中獲得教訓，沒有得到任何成長，反而因為他們的投機行為，啣嚙入獄。

四、結語

本論文分析了兩種自願性漂泊者的異同，在結語部分，對兩者間的相異處做一個概括性的論述：

對於宗教性質的漂泊者來說，重點是肉體上的磨難，他們透過飢餓、步行、忍受寒冷或嘲笑等各種苦行方式，透過肉身的痛苦來提升心靈的成長，在漂泊過程中身體受苦，但是精神上是愉悅、輕鬆的。他們的旅行和受苦是成聖的過程，或是透過重複聖人的歷程而得到心靈撫慰。

而非宗教性質的漂泊者，重點則是心靈上的受苦，而不是肉體上的受難，在他們漂泊過程中，不見得採取步行方式，也不見得需要忍飢挨餓，譬如托爾斯泰、奧聶金和畢巧林都是搭乘交通工具旅行，沒有步行、沒有苦修，他們在旅行途中照常吃喝、衣冠楚楚，肉體上並沒有受苦，但是他們的內心是苦澀的。這群漂泊者具有反社會人格，與家人或社會格格不入，他們在家裡如同在異域，必須透過離家旅行的方式，讓自己心靈慢慢獲得平靜，或是得到昇華。但是結果往往無法盡如人意，他們的旅行常常無法治癒內心的痛苦，只會讓他們的痛苦加劇。不論在家裡或在他鄉，都是個永恆的他者，與四周之人格格不入。心靈-意識上的漂泊者甚至連啟程的勇氣或機會都沒有，他們只能坐在家裡，

夢想著前往他鄉，追求夢想中的幸福。唯一相同的是他們的反社會人格和無法彌平的心靈傷痛，成為永恆的意識漂泊者(意識裡無法認同家鄉之人，雖然在家中也如同無家之人)。

就身分上來說，宗教型的漂泊者較多是下階層人民，朝聖者、聖愚者大都是農民；而心靈-意識漂泊者通常是知識份子，譬如：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等等，他們因為受過教育，喜歡思考而痛苦。宗教型漂泊者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多，在文學作品中他們通常出現在各種傳記，譬如：聖徒、使徒傳，或朝聖文學(паломн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裡，而在純文學作品中通常都是次要人物(譬如《童年》中的格里沙、《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佐西馬長老等等)。心靈漂泊者則是俄國文學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19世紀的文學作品，隨處可以看見這群在廣大俄國土地上四處漂泊的身影，他們鬱鬱寡歡、沉思不語，他們長吁短歎，心情鬱悶，有的還患有嚴重的憂鬱症，他們內心的痛苦似乎不管漂泊到哪都無法平復。這樣的心靈漂泊者，成為俄國文學中非常特殊的身影。

這兩種不同類型漂泊者的差異可以下列圖示表現：

類型	宗教型流浪者	心靈漂泊者
身分	農民或聖徒	知識分子
流浪方式	步行	步行或坐車
財富	貧窮	貧窮或富有
受苦方式	身體受苦	心靈受苦

身體受苦VS心靈受苦，這就是宗教型流浪者和心靈流浪者兩者間最顯著之差異。

蘇聯時期因為限制遷徙自由、實施嚴格住房管理和護照制度，在任何地方居住都得有當地居留證，房子必須透過配給方式方能取得，無法隨意遷入或遷出，遷徙自由受到箝制，帝俄時期大規模的漂泊現象因此絕跡，相應地這個主題也鮮少出現在蘇聯時期的文學作品內，不再成為重要議題。

參考書目

Thompson E.M. (湯普遜著)，楊德友譯 (1995)，《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 聖愚》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Осокина О.Н. Паломн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1800-1860-х годов:

Свящ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человек. М.: ФЛИНТА·НАУКА, 2015.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ПРЕСС, 1998.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 Т.9.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4.

Гончаров И.А. Нимфодора Ивановна.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Псков, 1992.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ушкин//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Т.26. С.136-149.

Есенин С.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одном томе. М.: Изд-во Альфа-Книга, 2009.

Задонский Т.. Творения иже во святых отца нашего Тихона Задонского.

Изд-во Свято-Успенского Псково-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1994. Т.4.

Капустин А.,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Пять дней на святой земле и в Иерусалиме. М.: «Индрик», 2007.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 пути к Троице.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iknigi.net/avtor-nikolay-karamzin/59695-istoricheskaya-vozpominaniya-i-zamechaniya-na-puti-k-troice-nikolay-karamzin/read/page-1.html>

(18.12.2016)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Том

10. Глава 4.–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kulichki.com/inkwell/text/special/history/karamzin/kar10_04.htm

(18.12.2016)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И. Юродство о Христе и Христа ради юродивые восточной 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и жития сих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М.: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Книговек, 2013.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М.: Изд-во «Правда», 1988.

Лихачев Д.С. Поэтик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ихачев Д.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Т.1.

С.261-654.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Э. Посох//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Э.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т. М.:

Арт-Бизнес-Центр, 1993. Т. 1.С.104.

- Моклецова И.В. Хожд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X-XX веков. Ч.1. М.: МГУ, 2003.
- Моторин А.В. Образ Иерусалима в русском романтизм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б. статей. СПб.: Наука, 1996. С.61-89.
- Ничипоров Б.В. Введение в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психологию. Глава: 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klikovo.ru/books/47140/47166.html> (18.12.2016)
- Панченко А.М. Юродивые на Руси//Панченко А.М.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 СПб.: Юна, 1999. С.392-407.
- Розанов В.В. Уединение // Розанов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1990.
- Сафронов А.В. После «Архипелага» (Поэтика лагерной прозы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Вестник Ряз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С. А. Есенина. № 3 (40), 2013. С.139-154.
- Смирнова О.А. Хронотоп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феномен 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опыт осмыс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ллект. Инновации. Инвестици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3, 2010. С.121-125.
- Теребилов В. И., Антонян Ю. М. Бродяжничеств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bse.sci-lib.com/article001405.html> (18.12.2016)
- Трубецкой Е. Иное царство и его искатели в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сказке. М.: Книга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2011.
-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Изд-во АСТ, 2003.
- Чаадаев П.Я.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Сборник). М.: ЭКСМО, 2006.
- Чертков В.Г. Уход Толстого. М.: Изд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олос Толстого", 1922.
- Щепанская Т.Б.. Культура дороги в русской мифоритуальной традиции XIX-XX веков. М.: ИНДРИК, 2003.
- Якеменко Б.Г. Нищенство, 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о и юродство и их место в народ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е // Якеменко Б.Г.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X-XVIII веков. М.: Изд-во РУДН, 2003.
- 本論文於 2017 年 9 月 14 日到稿，2018 年 1 月 26 日通過審查。